

丛书

巍巍丰碑——重唤毛泽东

巨人的性格

——毛泽东的书信

巴君编

地震出版社



A751
6
6

巨人的性格——毛泽东的书信

巴 君 编



地 震 出 版 社

1992

(京)新登字095号

巨人的性格——毛泽东的书信

巴君 编

责任编辑：陆晓梅

地 方 出 版 社 出版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9号

北京安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 1/32 3.875印张 93千字
1992年12月第一版 199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26200

ISBN 7-5028-0759-4/A·1 (1152)

总定价：21.00元 本册定价：2.30元

《巍巍丰碑——重唤毛泽东》

丛 书 编 委 会

主编 穆 宪

编委 穆 宪 赵喜明 李五一 王松鹤

傅强年 张金慧 王 薇 刘卫平

李中印 陈新权 张禹宾 杨 惠

李连仲 盖生福 樊 竞

参 加 编 写 人 员

穆 宪 李五一 佟 静 任铁缨

刘 燕 杨 惠 李华松 王 薇

温全信 商寅泉 张小莹 段 跃

姬 虹 聂北茵 沈雁英 贾秀娟

周涛勇 谢安邦 张世峰 阴建白

总 前 言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人民没有忘记他，并在重新唤起对他的怀念。

对于这样一位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命运的历史伟人，他仍然活在人民心中，仍然在激励无数的中国人奋勇投身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这部由中央所属八个单位的专业研究人员联袂编辑的毛泽东专辑丛书《巍巍丰碑——重唤毛泽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的。它是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的一份珍贵的礼物。

这套丛书除《伟大的足迹——毛泽东的生涯》一书是作者编著的外，其余七本均是根据各种资料汇编而成的。应当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是他们向读者提供了大量真实的反映毛泽东的经历、思想、社会交往及各种革命活动的珍贵资料。应当感谢李银桥、王鹤滨、张玉凤等早年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同志，是他们向读者披露了日常生活中的毛泽东的珍闻。此外，还应当感谢权延赤等一些热心从事编写毛泽东的经历、事迹的作者和出版各种版本介绍毛泽东的书籍的出版社。

总之，没有各方面的努力，这套丛书就不可能以“涵盖面广，信息量大，取材精练，史料充实，构思新颖”等特

点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套丛书在编辑过程中，曾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和指导，这对丛书的编辑工作无疑是巨大的鞭策和鼓励。

最后，我们还要诚挚地感谢地震出版社所给予的大力支持与合作。

编 者

1992年12月

总 序

毛泽东已经成为历史人物，但他是二十世纪的历史巨人之一。他的事业和思想的影响不仅仅限于中国，而且早已超越了国界。

199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为纪念这个异乎寻常的日子，全国许多出版社都在组织编辑出版歌颂毛泽东光辉一生的各种书籍。《巍巍丰碑——重唤毛泽东》八卷本丛书，就是其中的一种。编著者经过近两年的辛勤努力，终于使这套丛书同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应当祝贺的事情。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由于历史条件，像许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他也有错误，例如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但他的一生是光辉战斗的一生。不管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他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宏伟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花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永彪史册的杰出贡献。他的业绩、思想和风范，值得世世代代传颂。

丛书《巍巍丰碑——重唤毛泽东》所选用的资料，虽然大都为人们所熟悉，但立意新颖，构思独特，八卷内容，各有不同，别具风格，是一套很有特色的丛书。读了之后，一定会深深地唤起人们对这位历史伟人的不尽思念。

丛书的编著者都是在京的中央有关部门的专业研究人员，他们所做的这项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在我看来，应当称赞。当然，就丛书的内容而言，它只是从几个角度反映了毛泽东一生中的某些方面。如果有可能，还可以用更多的篇幅来阐述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他的光辉思想。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始终保持着崇高的威望。他的丰功伟绩和光辉思想，是一座永存的丰碑，将永远激励人们奋勇向前。

在《巍巍丰碑——重唤毛泽东》这套丛书即将出版之际，我写了这篇序言，表示祝贺，并向读者推荐。我相信这套别具特色的丛书的出版，将为人们，特别是青年读者所喜爱。

盖 军

1992年12月

目 录

总序	(1)
致蔡和森等	(1)
致彭璜	(12)
致李立三	(15)
致傅作义	(17)
致林彪	(19)
致宋庆龄	(21)
致蔡元培	(23)
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	(26)
致张学良	(29)
致叶剑英、刘鼎	(31)
致蒋介石	(33)
致徐特立	(36)
致何香凝	(38)
致雷经天	(40)
致艾思奇	(42)
致陈伯达	(44)
致张天闻	(48)
致毛岸英、毛岸青	(53)
致肖军	(55)
致周扬	(56)

致李鼎铭	(58)
致秦邦宪	(60)
致郭沫若	(63)
致谢觉哉	(65)
致柳亚子	(67)
致毛岸英	(68)
致李济深、沈均儒	(69)
致吴玉章	(71)
致吴晗	(72)
致杨开智	(74)
致冯友兰	(75)
致毛森品	(76)
致李淑一	(77)
致王逸民	(78)
致毛泽连、毛远悌	(80)
致黄炎培	(81)
致廖静文	(84)
致田家英	(85)
致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	(87)
致李达	(89)
致林铁	(91)
致曹云芳	(92)
致黄炎培	(94)
致杨开英	(96)
致藏克家等	(97)
致孙燕	(98)

致张治中	(99)
致邓小平	(100)
致周世钊	(101)
致胡乔木、吴冷西	(103)
致刘少奇、周恩来等	(104)
致陈云	(105)
邓小平	(106)
致胡乔木	(107)
致陆定一等	(109)
致陈毅	(110)

致蔡和森^[1]等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和森兄子昇^[2]兄并转在法诸会友：

接到二兄各函，欣慰无量！学会^[3]有具体的计划，算从蒙达尔尼会议^[4]及二兄这几封信始。弟于学会前途，抱有极大希望，因之也略有一点计划，久想草具计划书提出于会友之前，以资商榷。今得二兄各信，我的计划书可以不作了。我只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会友，对于二兄信上的计划，人人下一个详密的考虑，随而下一个深切的批评，以决定或赞成，或反对，或于二兄信上所有计划和意见之外，再有别的计划和意见。我常觉得我们个人的发展或学会的发展，总要有明确的路数。没有一条明确的路数，各个人只是盲进，学会也只是盲进，结果糟踏了各人自己之外，又糟踏了这个有希望的学会，岂不可惜？原来我们在没有这个学会之先，也就有一些计划，这个学会之所以成立，就是两年前一些人互相讨论研究的结果。学会建立以后，顿成功了一种共同意识，于个人思想的改造，生活的向上，很有影响。同时于共同生活，共同进取，也颇有研究。但因为没提出具体方案，又没有出版物可作公共讨论的机关，并且两年来会友分赴各方，在长沙的会员又因为政治上的障碍不能聚会讨论，所以虽然有些计划和意见，依然只藏之于各人的心里，

或几人相会出之于各人的口里，或彼此通函见之于各人的信里，总之只存于一部分的会友间而已。现在诸君既有蒙达尔尼的大集会，商决了一个共同的主张，二兄又本乎自己的理想和观察，发表了个人的意见，我们不在法国的会员，对于诸君所提出当然要有一种研究、批评和决定。除开在长沙方面会员即将开会为共同的研究、批评和决定外，先述我个人对于二兄来信的意见如左^[5]。

现在分条说来。

(一)学会方针问题。我们学会到底拿一种什么方针做我们共同的目标呢？子昇信里述蒙达尔尼会议对于学会进行之方针，说：“大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与世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以我的接洽和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更繁复地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了。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和森在八月十三日的信里说：“我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因我所见高明一点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家的色彩，于此两点，非严正主张不可。”除无产阶级专政一点置于下条讨论外，国际色彩一点，现在确有将它郑重标揭出来的必要。虽然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

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但是感情总要是普遍的，不要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这是一层。做事又并不限定在中国，我以为固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它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帮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都是很要紧的。以下说方法问题。

（二）方法问题。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一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的专政”。和森又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⁶⁾，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证明，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而子昇则说：

“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蒲鲁东⁽⁷⁾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同时李和笙⁽⁸⁾兄来信，主张与子昇相同，李说：“社会改造，我不赞成笼统的改造，用分工协助

的方法，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我觉得很好。一个社会的病，自有它的特别的背景，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⁹⁾在长沙演说，意与子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¹⁰⁾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罗素和子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以资本主义教儿童，这些儿童大了又转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地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地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

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以上是第一层理由。第二层，依心理上习惯性的原理及人类历史上的观察，觉得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人生有一种习惯性，是心理上的一种力，正与物在斜方必须向下之为物理上的一种力一样。要物不倾向下，依力学原理，要有与它相等的一力去抵抗它才行。要人心改变，也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去抗它才行。用教育之力去改变它，既不能拿到学校与报馆两种教育机关的全部或一大部到手，虽有口舌、印刷物或一二学校报馆为宣传之具，正如朱子所谓“教学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11〕}，直不足以动资本主义者心理的毫末，哪有回心向善之望？以上从心理上说。再从历史上说，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这种现实欲望，只向扩张的方面走，决不向减缩的方面走，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是一定的心理。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有拿破仑第一^{〔12〕}称帝失败了，又有拿破仑第三^{〔13〕}称帝。有袁世凯^{〔14〕}失败了，偏又有段祺瑞^{〔15〕}。章太炎^{〔16〕}在长沙演说，劝大家读历史，谓袁段等失败均系不读历史之故。我谓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求遂所欲是冲动的事，智慧指导冲动，只能于相当范围有效力，一出范围，冲动便将智慧压倒，勇猛前进，必要到遇了比冲动前进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将它打回。有几句俗话，“人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山望见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均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以上从心理上及历史上看，可见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是第二层理由。再说第三层理由。理想固要紧，现